

人视水见形

视民知治不

□林雅华

“人视水见形，视民知治不”出自《史记·殷本纪第三》，意思是，人从水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形象，从百姓精神面貌中可以知道国家的治理状况。简而言之，就是“以民为镜”。这一论断用朴素的比喻深刻阐明了“治道”与“民心”的本质关联。治理是否清明、政令是否得当，无需外求他证，百姓的衣食冷暖、言行向背便是最直观的答案。

自先民探索治道以来，“视民知治不”便贯穿历代王朝更迭，成为深刻的历史镜鉴。从政权兴亡角度来看，百姓安则政权固，百姓怨则政权危。西周初年，周公鉴于商亡教训，提出“敬天保民”思想，主张“知小民之依”。成王、康王践行这一理念，实行轻徭薄赋，使百姓“耕者九一，仕者五禄”，周政权由此得以巩固，享国八百年。反之，秦一统六国后，不仅横征暴敛，还强征苦役，使百姓“力罢不能胜其役，财尽不能胜其求”。最终，陈胜吴广揭竿而起，动摇了强秦根基。从社会稳定角度分析，百姓和则社会宁，百姓乱则社会溃。西汉文景时期，推行“与民休息”政策，不仅简化了法律条文，还减轻了田租负担，使百姓得以自给自足，整个社会呈现出和谐景象。而东汉末年，灵帝“私令左右卖公卿”，官吏贪婪残暴，致使千里沃野化作赤地，流民易子而食，最终引发黄巾起义，社会秩序彻底崩塌。这恰恰印证了“国治则民安，事乱则邦危”的治理规律。从文化发展角度来看，百姓富则文化兴，百姓贫则文化衰。贞观年间，唐太宗摒弃奢侈，减轻徭役和赋税，选拔任用清廉的官吏，让百姓衣食充足、安居乐业，由此催生了诗歌、艺术、史学的空前繁荣，形成了“盛唐气象”。反观明末，朝廷额外加征辽饷、剿饷、练饷三种赋税，百姓不堪其负，民生凋敝。文人或沦为流民，或遁入空门，致使晚明文化陷入“万马齐喑”的困境。这表明，百姓的安乐富足，直接关系到文化创造的活力与文明传承的延续。

“视民知治不”的论断之所以具有穿越时空的生命力，源于其对治理本质的深刻洞察，即百姓在国家治理中的三重核心地位。

民者，治之根基也。治道优劣的关键在于是否视百姓为国家存续的根本。老子以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”点明了统治者当以民意为本。战国时期李悝在魏国推行变法时，不仅通过土地肥力的测算制定差异化田赋，更编订《法经》保护农民财产，充分激发了百姓的生产主动性，使得魏国农田开垦面积三年间增长近半，粮食储备激增，一跃成为霸主。这正印证了“政之所兴在顺民心，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”的治国之道。

民者，治之归趣也。一切施政方略最终要以民生福祉为归依。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中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的古训早已指明，唯有百姓利益得到切实维护，国家方能长治久安。北宋仁宗时期，面对土地兼并加剧的隐患，朝廷不仅连续十年减免全国农业税，更在各路普设“常平仓”与“义仓”，形成“丰年余、歉年举”的联动机制，丰收时以高于市价收购粮食避免谷贱伤农，灾年则以低于市价发售缓解饥荒。同时严令地方官“不得擅增苛捐”，从制度层面阻断侵害民生的渠道。这些举措使当时“四方无事，百姓康乐”，东京汴梁更是呈现繁荣景象。

民者，治效之权衡也。治道虚实的检验最终体现于百姓的生计状态。东汉光武帝刘秀平定天下后，面对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的战后疮痍，颁布六道诏令释放奴婢，恢复其

自由民身份与生产权；将田租从“什一税”降至“三十税一”；组织民力修复芍陂、鸿隙陂等水利工程，灌溉农田数百万亩。短短十余年间，百姓“安其居，乐其业”，中原大地重现“麦陇连云，桑麻蔽野”的景象。由此可见，百姓的生计状态就是治理成效最忠实的“记录仪”，治道务实则民生兴旺，治道虚浮则民生困顿。

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核心理念之一，“视民知治不”能够从治理理念落地为实际成效，依靠的是一套涵盖思想文化、制度安排、行动举措与反馈机制的完整体系，其内核正在于确立“以民为镜”的治理逻辑。

首先，确立“重民”的价值导向。西周青铜器铭文中“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”的政治宣誓，体现了早期政治文化中的重民意识。到春秋战国时期，《管子·牧民》系统阐述的“政之所兴，在顺民心”的治理原则，将重民思想发展为系统的治国理论。汉代贾谊在《新书·大政》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：“夫民者，万世之本也”。唐代魏征在《谏太宗十思疏》中直言“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；载舟覆舟，所宜深慎”，进一步体现了“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”。这种价值导向的树立，为“视民知治不”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。

其次，建立“察民”的机制保障。中国古代通过多种制度设计体察民情：一是“采诗”制度，如周代设“行人”之官，“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，献之大师，比其音律，以闻于献之天子”，使君主通过诗歌了解民间疾苦；二是“巡狩”制度，《明会典》明确规定，“代天子巡狩”的职权包含了“察官吏贤否、民生利弊”的具体要求，通过建立中央直达基层的信息通道来确保民情的真实反馈；三是“信访”制度，汉代设“公车司马令”，负责接收吏民上书，唐代置“匭使院”，允许百姓投书言事。《唐六典》规定，观察使必须“巡属县，观风俗，问百姓”，并将调查结果“岁终具状以闻”。这些制度安排为“视民知治不”提供了有效的民情上达途径。

再次，推行“利民”的施政策略。古代贤吏深谙“治政之要，在于安民”，始终将百姓实际需求作为施政出发点。宋代苏轼任徐州知州时，恰逢黄河在曹村决口，洪水直逼徐州城。他既未退缩也未坐等朝廷指令，而是亲赴军营，动员禁军与百姓一起筑堤抢险，在城墙上搭建棚屋昼夜值守，历时七十余日终将洪水挡在城外。灾后又迅速组织百姓修复被冲毁的农田，主持疏浚百步洪、吕梁洪等河道以利灌溉，甚至亲自指导工匠改良农具。百姓感念其功，亲切地将苏轼称为“苏徐州”。明代海瑞任淳安知县时，更是将“利民”刻入心中。遇权贵过境勒索，他以“县小财薄，不足以供”硬扛，却为贫寒学子“置学田二十亩，供其膏火”；断案时“民告官者必细查，贫者冤屈必昭雪”，让百姓切实感受到“政清则民安”。

最后，形成“便民”的纠错机制。宋代的谏官制度便是典型，谏官言事可不避权贵，弹劾贪官污吏。如宋仁宗时，谏官欧阳修弹劾转运使王逵“苛敛百姓，民不堪命”，虽王逵有宰相庇护，欧阳修仍“连上七疏”，最终迫使朝廷将其罢黜。此外，地方层面的述职制度也十分严格。以唐代为例，每年秋冬之际，各县令需亲赴州府向郡守述职，郡守再汇总至朝廷，隐瞒不报者“以欺罔论罪”。唐宪宗元和年间，海州县令王某在述职时，为粉饰政绩，隐瞒了当地盐场官吏“额外加征盐课，致百有余户煮盐民逃亡”的实情，郡守李元素核对“逃户名册”与述职文书时，发现“在册逃户二十，实际逃户百三”，当即拍案怒斥，随后上奏朝廷弹劾。最终，王某因“欺罔君上，蔽塞民情”被判处“流放岭南”。这种“便民纠错”机制，让“视民知治不”不再是静态的理念，而成为贯穿治理全过程的动态实践。

“人视水见形，视民知治不”这句古训所蕴含的深邃智慧，道出了一个治理真谛：当治理者以百姓为镜，便能照见自身施政的得失；当治理举措以百姓福祉为归依，国家便会走向兴盛；反之，若背离百姓意愿，无视百姓疾苦，再强大的政权也会失去根基。这一思想的价值，不仅在于提供了评判治理的标准，更在于确立了“以民为本”的治理伦理。唯有始终将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，以百姓的满意度为标尺，才能实现“治道昌明”的理想境界。



从利玛窦到南怀仁：在中西文明对话中构建地理知识体系

□陈欣雨

16 世纪末至 18 世纪初，以利玛窦（Matteo Ricci，1552—1610 年）、南怀仁（Ferdinand Verbiest，1623—1688 年）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，以科学为舟、文化为楫，与中国士大夫阶层携手，陆续绘制了《坤輿万国全图》《坤輿全图》《康熙皇舆全览图》等地理杰作，不仅重塑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，更在中西文明对话中构建了独特的地理知识体系，为当下地理测绘学、全球化视野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历史启示。

从“天圆地方”到“万国全图”地理认知变革。自先秦以来，中国以“九州”“华夷”为核心的地理观根深蒂固，认为中原王朝居于“天下之中”，四方皆为蛮夷。比如《吕氏春秋·审分览》：“古之王者，择天下之中而立国”；《荀子·大略》：“欲近四旁，莫如中央，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，礼也。”这种观念从《周礼》记载的“九畿之制”到《尚书·禹贡》描绘的“九州方圆”；《华夷图》的“万邦来朝”等传统舆图中已然固化。直至明末利玛窦携西方地理学知识而来，首次以科学实证的方式带来了地理认知的变革。柳诒徵先生曾评价“元、明间人犹未混究心于地理，至利玛窦等来，而后知有五大洲，及地球居于天中之说”。

利玛窦在《坤輿万国全图》中首次向中国系统传播了地圆说、经纬度体系及地球公转理论。他在序言中强调“地球如鸡子，黄白同居”，以通俗的比喻解释地球与天体关系，化解了传统“天圆地方”说的桎梏。该地图采用等积投影法，将五大洲、四大洋铺展于世人眼前，更以中国为地图中心，并采用易学术语“坤輿”为地图命名，辅以汉字注记与儒家伦理的释文，巧妙平衡了科学真实与文化认同。而地图上的“欧罗巴”“亚细亚”等汉译地名，以及南极洲、美洲等未知区域的呈现，使明代士大夫首次意识到中国虽雄踞亚细亚腹地，却仅是“万国”之一而非“天下”全

（上接 1 版）着眼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，必须把握高科技、高效能、高质量的内在要求，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，摆脱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、生产力发展路径，促进技术革命性突破、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，发展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边生产力质态。

准确把握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面临的新形势

新时代以来，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，我国两化融合取得了一系列成就，推动制造业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发展迈上新台阶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。

工业自动化基础愈发稳固。工业控制系统领域，涌现出一批优质企业，可编程逻辑控制器（PLC）、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（SCADA）、集散控制系统（DCS）等产品快速发展，部分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。工业机器人方面，我国已连续 11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国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工业机器人密度达 470 台/万人，远超全球平均水平。

数字化转型纵深推进。深入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，坚持分业施策，编制印发 12 个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指南，建设 14 个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场景图谱。截至 2025 年 6 月底，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、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 84.0%、66.8%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百城试点工作提速扩面，带动近 4 万家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，培育“小快轻准”解决方案 1 万余项。同时，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，2025 年上半年，软件业务收入 70585 亿元，同比增长 11.9%，云计算、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 7434 亿元，同比增长 12.1%。网络化连接全域延展。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，网络、标

部，这更正了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的传统认知。这种冲击直接引发了士大夫阶层对“天下”与“世界”关系的反思，如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学者开始接受地圆学说，并尝试将西学融入儒家知识体系。

南怀仁的《坤輿全图》相较于利玛窦的椭圆形世界图而言，采用球极平面投影法，将地球分为东、西两半球，直观呈现地球的曲面特征，不仅打破了中国传统“地方”的认知，而且客观上弱化了“中央之国”的独特性。这种划分使中国人首次意识到，世界并非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板块，而是由相互关联的陆地与海洋构成的整体。进而首次提出“小西洋”（印度洋）概念，并标注欧罗巴（欧洲）、利未亚（非洲）、亚细亚（亚洲）、南北亚墨利加（美洲）和墨瓦蜡泥加（南极洲）五大洲的经纬界线，这突破了传统中国以“四海”（东海、南海等）为核心的封闭海洋观，而是把中国置于与其他大洲平行的位置，这暗示了多元文明共存的全球图景。

以实测经纬传地理真知的科学精神交融。利玛窦《坤輿万国全图》首次引入经纬线网络，其投影方式虽未完全采用墨卡托法，但已具备现代地图学的雏形。并在附注中详细解释其数学原理。李之藻在序言中称此图“以天度定地理”，将天文观测与地理定位结合，彻底革新了传统舆图仅依赖相对位置的表达方式。故《坤輿万国全图》的绘制并非简单译介，而是基于实测数据的科学实践。结合欧洲三角测量法与中国传统的“计里画方”技术，对重要城市经纬度进行测算。例如，北京被标注为北纬 40 度（实际为 39.9 度），误差仅 0.1 度，远超同期中国舆图的精度。在地图中，利玛窦不仅展示地理轮廓，更通过附注文字系统阐释了地球的物理属性：如赤道、南北极、气候带划分，以及潮汐、地震等自然现象的成因。图中附有九重天图、日月食原理、昼夜长

识、平台、数据、安全五大体系一体部署、一体应用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球领先，5G 基站达到 455 万个，千兆用户突破 2 亿，实现“县县通千兆、乡乡通 5G”。标识解析体系全面建成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 340 家，重点平台设备连接数超 1 亿台（套），服务企业近 400 万家次，实现 41 个工业大类全覆盖，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步入规模化应用新阶段。

智能化升级动能强劲。智能制造工程扎实推进，突破一批智能制造装备和系统解决方案，建成 5400 余家先进级和 230 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，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智能制造示范标杆。人工智能发展迅速，涌现了一批开源通用大模型，以及钢铁、能源等行业大模型，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智慧动力。

总的来看，我国两化融合已站在新的更高起点上，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。从技术发展看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，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，人工智能、量子技术、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，融合机器人、数字化、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加速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、服务化、绿色化转型，人工智能成为影响未来发展的关键变量。从国际局势看，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、价值链正在深度调整，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明显上升，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加大对智能制造、工业互联网、数字供应链等融合发展领域的政策支持，并抢夺数字技术标准、经贸规则制定的主导权，融合发展领域国际竞争日益加剧，成为大国竞争博弈的焦点。从国内形势看，我国工业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、由大变强的重要关口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，制造业总体上正在加速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，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，数字技术创新能力、创新产出、创新成果转化不足，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相对较慢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难度较

短变化等天文图解，他介绍了各国的自然地理特征、气候条件、物产资源以及人文社会情况，如风俗习惯、宗教信仰、政治制度等。如南美洲标注“此地多金银”“波斯多宝石”“欧罗巴人精于天文”等。

而南怀仁在《坤輿图说》中强调“以天度测地理”，即通过天文观测（如测量北极星高度）确定经纬度。他引入欧洲的球面三角学和天文测量法，并结合中国传统的“勾股术”进行数据修正。例如，他详细说明如何用“测日影法”推算纬度，并设计《量天尺图》（一种测量天体高度的工具）辅助观测。这种实测方法使经纬度不再是抽象概念，而是可操作的量化指标。在其图中，实测经纬点达 630 余处，覆盖东北至库页岛、西南至西藏的广阔疆域。这一工程不仅提升了地图精度，更推动了中国地理学从经验描述向实证科学的转型，成为后续大规模测绘的起点，特别是对《康熙皇舆全览图》起到了示范效应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南怀仁将本初子午线设于北京，既顺应了清代“以中土为尊”的政治需求，又暗含了西方科学中“统一坐标原点”的逻辑。此举巧妙调和了中西文化冲突，使经纬体系更易被中国士大夫接受。他在《坤輿图说》中解释：“子午线定于京师，则天下方位皆可依此推算”，既保留中国中心观，又介绍了全球坐标体系，这种交融不仅传递了地理真知，更重塑了中国士人对世界的认知方式——从“以中释外”走向“以天（科学）释地”，为近代中国接受全球化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。

从地理空间到文明对话。作为中西地理知识交融的结晶，利玛窦《坤輿万国全图》既引入奥特柳斯（Abraham Ortelius，1527—1598 年）《世界概貌》的投影法，又整合《大明一统志》的本土地理习俗，其绘制方法直接影响了清代官修地图的范式。康熙《皇舆全览图》采用桑逊

大，数据要素价值潜力尚未有效激活，数字经济发展优势还未能充分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力，推进两化融合任重而道远。

奋力谱写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新篇章

对照我国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目标，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仍需进一步深化。要持续完善制度设计、筑牢数字底座、推动产业转型、汇聚资源要素，把深度融合贯穿工业和信息化工作全过程，推动深度融合发展实现从“物理叠加”到“化学反应”的跃升，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提供有力支撑。

健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制度。完善发展机制，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，着力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。提升治理水平，创新数字经济评价机制，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，构建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，把监管和治理贯穿创新、生产、经营、投资全过程。完善要素配置制度，加强数据交易流通、开放共享等制度规范的研究制定，健全金融支持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机制，充分激发资本、技术、数据等要素活力。

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。通过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、产业基础再造工程，大力发展核心基础零部件、核心基础元器件、关键基础材料、关键软件、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加快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，推动在企业布局建设更多国家级创新平台，建设高水平产业科技创新平台网络，加快中试和应用验证平台建设。完善首台（套）、首批次、首版次应用政策，出台推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，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，促进更多科技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、形成产业。

（Nicholas Sanson d’Abeville，1600—1667 年）所发明的投影法，并首次以汉字标注全国地名，其科学性与权威性延续至近代。甚至还深刻影响了东亚地理学发展，比如日本学者新井白石（1657—1725 年）于 1708 年所绘制彩绘本《坤輿万国全图》，其参考亦可溯源至利玛窦的地图。

利玛窦与南怀仁的地图实践，本质上是双向知识传播的产物：前者将欧洲地理大发现成果引入中国，后者通过《中国新图志》向欧洲介绍东方，正如葛兆光所言，地图使中国从“天下”走向“万国”。在利玛窦地图上，详细标注了欧亚非大陆的贸易路线与关键节点，如“西域诸国”“波斯湾”“印度洋航线”，与古代丝绸之路高度重合。而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痕迹亦清晰可辨：从马六甲到霍尔木兹，从好望角到墨西哥，航线与贸易节点标注翔实。利玛窦对中亚、西亚地理的细致描绘，为当代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中的历史脉络考证提供了依据。而在南怀仁的地图中地名翻译堪称文化转译的典范：“亚细亚”对应“亚洲”，“欧罗巴”对应“欧洲”，这些音译词既保留了异域色彩，又融入汉语构词法。对于“地球”“赤道”“北极”等概念，则采用意译策略，如将“Equator”译为“赤道”，契合《周礼》“日道”之说。故二人地图是早期全球化时代文明互鉴的典范。利玛窦通过地图向欧洲传递中国信息，引发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“汉学热”；而中国士人则借地图重新定位自身，催生了徐光启“会通超胜”的文化自觉。

万国星列，各有其华；文明如河，百川竞流。从利玛窦到南怀仁，他们正是通过地理学这门“世界语”，完成了一次平等的文明对话。当今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深层价值，正与这种对话精神一脉相承——全球化不是文明的趋同，而是让每个文明在地球上找到自己的经纬度。

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创新发展。壮大云计算、大数据、区块链、虚拟现实、工业软件等数字产业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开源生态，加快发展和数据安全产业，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。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，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、人工智能、生物制造、低空经济、人形机器人、6G、原子级制造等领域科技创新，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。适度超前布局建设 5G、算力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，加快工业互联网网络体系化发展，强化网络基础设施安全防护能力建设。

推动制造业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发展。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。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，开展“人工智能+制造”行动，建设高质量的工业数据语料库，培育若干通用大模型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。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，大力发展智能产品和装备、智能工厂。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，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融合技术创新研发和应用，深入实施绿色制造工程，构建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。

促进先进生产要素向融合领域集聚。建设高质量两化融合标准体系，提升标准的国际化水平，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。深化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，加强新工科建设，支持行业企业、职业院校、公共实训基地等，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。强化多元化、接力式金融服务，发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作用，扩大实施“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”专项，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。加快发展数据要素市场，培育数据产业经营主体，加快布局重点行业数据空间建设，推动数据价值挖掘与创造，更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。

（作者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）